



朝鲜寓言拟人传记文学研究

A Study of Allegorical &
Authropopathic Biography of Choson

李 岩 李杉婵 著



朝鲜寓言拟人传记文学研究

A Study of Allegorical &
Authropopathic Biography of Choson

李 岩 李杉婵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鲜寓言拟人传记文学研究 / 李岩, 李杉婵著.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301-28519-0

I . ①朝… II . ①李… ②李… III . ①寓言—文学研究—朝鲜 ②传记文学—文学研究—朝鲜 IV . ① I31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4319 号

书 名 朝鲜寓言拟人传记文学研究
CHAOXIAN YUYAN NIREN ZHUANJI WENXUE YANJIU
著作责任者 李 岩 李杉婵 著
责任编辑 刘 虹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519-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554992144@qq.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438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29 印张 510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序

在文学大家族中，小说是呈现方式最灵活多样的艺术形式。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擅长和喜爱的小说形式。它的多样性，甚至哪怕是语调的变化、思想情绪的波动，也可能带来小说形式的变化，更不用说各自独特的叙事风格、视角、方式、格调等各类魔方因素的变化。正如德裔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所说，小说是“我们最丰富、最有性格、最流行的文学产品”，它的艺术形式“如今仍在发展”“仍然以前所未有的效果，全新的结构和技巧手段，使评论家们感到惊奇。”^①这句话，明确地概括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内容和形式的可变性与多样性。本书的研究对象——古代朝鲜拟人传记体文学作品，作为其早期的小说形态，就是在其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宠儿。高丽时期开始流行的拟人传记体作品，作为文人排忧解闷的“虚构”的文体，正好体现了小说包罗万象、灵活自由的文体特征。

古代朝鲜长期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将小说之类的叙事文学体裁视为“不经之语”，坚信《春秋》里所说“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认为小说正是“士传之言”。这种“言”，不合大道，“无补于经世致用”，乃智者所不为。朝鲜朝中期以后，更把小说视为“吾道之大敌”，将小说排斥于文人文学之外。不过，对小说的这种观念和政策，阻挡不住进步文人对小说的喜爱和向往。高丽文人崇尚唐宋之学，膜拜“八大家”，学得小说之法，将韩、柳之《毛颖传》《蝦蟹传》等拟人传记体当作奇文来模仿。由此，各种拟人传记体作品在高丽文人笔下产生，林椿、李奎报等文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进入朝鲜朝中期，朝野上下以宋学为典范，贬斥小说类创作，禁购、禁读小说类作品。小说文体的创作和发展遭遇了空前的挫折。在惟理学为独尊之学的思想文化环境下，文人们不能直接兜售小说，往往借助鬼怪、幻境的艺术想象，或传奇的表现手法反映社会问题，以“以文为戏”的方式来混淆视听，曲折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特殊的创作倾向下，各类寓言小说、拟人传记体小说、传奇作品陆续涌现，装点了当时寂寥的小说界。尤其是前二者，以物拟人、以物理喻人事的“摹写”手法，正好为当时的朝鲜文人提供了一层“障眼

^①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34页。

之色”,蒙混过封建当局的文禁壁垒。因此,拟人传记体文学逐渐成为了朝鲜朝文人喜爱并敢于书写的文学体裁,从而产生了诸多优秀的作品。

这次出版的《朝鲜寓言拟人传记体文学研究》,就是以这样的历史文化土壤和文学传统为背景,经过多年的努力撰写而成的。值得说明的是,本书的“朝鲜高丽时期拟人传记体文学”部分,是由李杉婵的博士学位论文所组成。当初,我们觉得朝鲜拟人传记体文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还贯穿整个朝鲜封建时期,足有一千多年的创作历史,是古代朝鲜颇有影响力的文学样式。如果仅由一篇十六七万字的学位论文来反映它或者付梓出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们做出了更为大胆的计划,让它以整体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分工上,李岩负责撰写高丽时期以前的内容和朝鲜朝时期属于时代和思想文化背景的部分,其余的朝鲜朝部分的内容由李杉婵撰写,全书五十余万字。这本书之前,国内外曾出现过一些零星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很难见到如此系统研究有关朝鲜古代寓言拟人传记体文学的专著。

小说有无限的多样性,这给我们增加了不少难度。尤其是像朝鲜寓言拟人传记体小说,因为它采用“借物喻人”的艺术手法塑造人物,结构故事情节,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素,所以研究起来难度较大。由于我们的自身条件所限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由一两个人的力量去搬弄完成它,显然很困难,因此本书反映的只是管窥锥指,如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就万幸了。静候学界同仁的指教。

本书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有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李岩 李杉婵
2017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朝鲜古代寓言志怪史滥觞	1
第一节 朝鲜三国社会和俗文学	1
第二节 复杂的思想文化背景	13
第三节 文学背景和神怪故事	31
第四节 三国时期的智慧故事传统	44
第五节 朝鲜三国寓言一瞥	53
第二章 统一新罗时期的寓言和志怪	64
第一节 社会思想文化背景	64
第二节 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学	73
第三节 统一新罗时期的志怪和传奇故事	79
第四节 《花王戒》的思想与艺术	86
第五节 类似于寓言的动物故事	97
第三章 假传体文学的源与流	114
第一节 传记及传记文学	114
第二节 “以文为戏”的传统及假传之寓言特征	122
第三节 “以文为史”的传统及假传的史传特征	136
第四节 韩愈与唐代假传体文学	144
第五节 宋代及宋代以后的假传体文学	155
第四章 朝鲜高丽朝中后期的汉文文学与假传体文学	163
第一节 高丽朝中后期的社会及思想文化	163
第二节 高丽朝中后期的汉文文学与“假传”	170
第三节 高丽时期的传记各体	178
第四节 朝鲜寓言传统与假传体文学	192

第五章 高丽假传体文学的思想意蕴	200
第一节 林椿的“二传”分析	200
第二节 李奎报的“二传”分析	215
第三节 高丽佛教僧侣的“假传”	228
第四节 高丽其他假传体文学作品分析	240
第六章 高丽假传体文学的艺术特色	250
第一节 高丽假传体文学的登场及其艺术化历程	250
第二节 高丽假传体文学的创作方法	256
第三节 高丽假传体文学的艺术分析	262
第四节 高丽假传体文学的人物形象分析	272
第七章 高丽假传体文学在朝鲜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277
第一节 高丽假传体文学对中国相应体裁文学的继承	277
第二节 高丽假传体文学在朝鲜古代叙事文学 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	281
第八章 朝鲜朝社会与假传体文学	289
第一节 朝鲜朝前期的社会和思想文化政策	289
第二节 朝鲜朝中期士林与勋旧二派之矛盾与斗争	294
第三节 朝鲜朝假传体文学之发展	298
第九章 朝鲜朝前期假传体文学的始兴	304
第一节 朝鲜朝假传体文学之思想意蕴	304
第二节 朝鲜朝“天君”系列拟人假传体文学	336
第三节 黄中允《天君纪》对性与理关系的艺术化	341
第四节 郑泰齐《天君衍义》对朱子学学理的艺术解构	350
第十章 朝鲜 16—17 世纪四色党争之文化性格与文学	369
第一节 党争的社会背景	369
第二节 四色党争的复杂过程和本质	374
第三节 朝鲜 16—17 世纪四色党争的文化性格	378

第十一章 朝鮮朝節令植物寓言之人文特色	390
第一节 《花史》的思想意蕴及其“人物”形象	390
第二节 《四代紀》的历史文化意蕴	400
第三节 从《四代春秋》看节令植物寓言小说之文化意蕴	405
第十二章 朝鮮朝人文寓言之思想与艺术	413
第一节 托梦游历与觉而叹世的梦游录类人文寓言	413
第二节 辛辣的讽刺性与寓意的现实意义	422
第三节 柳梦寅的人文寓言《虎阱文》	427
第四节 朝鮮古代杰出的文人寓言小说——《虎叱》	430
第十三章 动物寓言的思想艺术特色	438
第一节 “兔鳌传”系列寓言的思想艺术特色	438
第二节 “鼠狱”系列寓言的思想艺术特色	441
第三节 “禽鸟”寓言的代表作《莺鸠鹜讼卧渴先生传》	448
参考文献	454

第一章 朝鲜古代寓言志怪史滥觞

朝鲜三国，是志怪、寓言和传记类文学样式大量产生的时期。这些文学样式是继其神话传说时代之后，又一个能够反映当时历史和时代意识的精神产物。它们也是研究和把握朝鲜三国时期历史和文化的“活化石”，对我们把握当时的时代思想和文学提供着极其珍贵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资料。朝鲜是历史上战争和历史事变频仍的国家，其历史文献和其他文化资料乃充当了这种历史阵痛的牺牲品。因为这种缘故，如今的我们不能直接看到高丽金富轼等所著《三国史记》以前的任何文献资料。幸亏朝鲜高丽时期的金富轼等文人学者和像一然这样的僧侣阶层及时地从当时还可以看到的若干古代资料中选择一些对己有用材料，编撰出像《三国史记》《三国遗事》这样的正史和野史，让后世的人们得以了解朝鲜古代的历史和思想文化，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其中保存下来的大量志怪、寓言和传记类的文学样式，是我们研究朝鲜三国时期的思想文化极其宝贵的史料，它们包含着朝鲜部族国家后期和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哲学、天文学、医学、宗教学、艺术、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等，我们从中可以构拟出朝鲜部族国家后期、三国时期的社会历史和这些文学样式的基本面貌。

第一节 朝鲜三国社会和俗文学

志怪、寓言和传说，是朝鲜三国时期最值得研究的文学领域。三国时期是朝鲜志怪、寓言和传说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与这时期的社会思想、民间信仰互为表里的这种文学样式，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在研究该时期意识形态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靠近这种文学样式，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的时候，绝不能忽视养育它们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土壤。要正确地认识它们和实事求是地把握它们，这一点至关重要。

自朝鲜三国初创至其发展阶段，正处于朝鲜古代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期，是朝鲜历史上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思想文化和文艺所呈现出的多彩斑斓、层出不穷的万千气象，必须从当时的整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寻找其根源。

公元前1世纪中叶前后,朝鲜三国先后在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辽东地区建立。历经了漫长的部落国家和部族联盟国家时期的朝鲜,逐步进入了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阶段。

公元前1世纪初,高句丽于古朝鲜旧领域建国。史传高句丽是夫餘族分支,很早以前就生活在如今中国辽东地区和朝鲜西北地区,公元前37年朱蒙在卒本^①建立的高句丽,是高句丽族所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形态。高句丽民族历史悠久,先秦古籍《逸周书·王会篇》所说的“北方台正东高夷”,指的就是后来高句丽族的先民。孔颖达对其疏云:“高夷,东北夷高句丽。”其后的诸多古文献,都有相关记载,如《尔雅》载:“九夷之中,其三即高句丽。”这些文献都一致指出“高夷”就是高句丽族,这些史料说明,高句丽族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于该地区。对高句丽建国以后的情况,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记录道:

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餘接……其人性凶急,喜寇钞。^②

这一记录明确记录着高句丽国家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和民族习性。由于它与夫餘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古代史料都极其重视对夫餘族及其国家的考察。《三国志》《魏志·东夷》中记曰:

扶餘:“夫餘,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鮮卑接……其人粗大,性強勇謹厚……以弓矢刀矛为兵,家家自有铠仗。”^③

由于高句丽族源与夫餘族有密切关联,其民族性与其大体相仿。这一记录显示,公元前1世纪时的夫餘,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而这种经济基础和先进文明不能不影响高句丽社会。高句丽在其建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的征战和政治融合的洗礼。现存当时的碑志文《国冈上广开土壤平安好太王碑铭》《龙冈枯蝉县神祠碑铭》等和通过李奎报《东明王篇》等所反映的《旧三国史》等内容来看,朱蒙在创国的过程中讨灭了周围挹娄、弗流等一系列小国,为高句丽的开国铺平了道路。尤其是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迁都国内城后,战争更为频繁,先后征服了邻近的沸流、盖马、荇人、曷思、梁、貊、东沃沮、句荼、朱那等地

^① 今我国辽宁省桓仁县。

^② 陈涛《三国志·魏志·东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③ 同上书,第90页。

方小国势力,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国家根基。高句丽建国前后,广泛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制造出各种生活用品和武器。在此基础上,高句丽建立了封建制度,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人民生活和国力空前发展。我们发现,《三国史记》中屡有国王赐封建“食邑”的记载,这些“食邑”一开始虽只赐以收租权,但后来都演变成了私有土地。与此同时,各代国王还对一些功勋卓著者直接赐田,受田者的这些田产后来也都不断扩大,以收租的形式剥削农民。“富益富,贫益贫”,这些大土地所有者逐步变成大贵族和地主势力,成为了封建国家的基本支柱。这样高句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主要有国有土地、封建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自耕农的私田等。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引起了阶级结构的变化,而阶级结构的变化则带来了社会组织机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本质性变化。尽管如此,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高句丽社会中依然残留着奴隶制社会的余影,特别是人们的头脑中存在的古老意识,往往以很强的惯性左右着其意识形态活动。

百济王朝与高句丽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据传,北方辰国处于分裂状态时,朱蒙的次子温祚带领一部分高句丽人南下,至汉江下游定居,与当地新兴封建势力结合,形成一支新兴的封建政治势力,并建立了新的封建国家“百济”。《三国史记》记载:

朱蒙嗣位,生二子,长曰“沸流”,次曰“温祚”……温祚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为辅翼,国号“十济”,是前汉成帝鸿嘉二年也……后以来时百姓乐从,改号“百济”。^①

根据这一记录,百济建国者的确是高句丽创业之主朱蒙的后裔,其传统和习俗都与高句丽相近,只是它在朝鲜半岛中西部地区另辟一个政治势力,与高句丽和新罗二国形成鼎足的形势。由于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又继承了辰国的文明,百济因而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公元前后,百济的政治势力逐渐壮大,不断向南发展,占据锦江以北地区,又经过一系列征服战争,占领马韩地区。到公元1世纪中叶,百济迅速成长起来,已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

百济建国后,为汉江下游地区的生产力带来了相当的发展。今京畿道杨州郡曾经发现炼铁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了铁斧、铁小刀、铁镞等和一堆炼铁渣。京畿道加平郡也发现炼铁坊遗迹,还挖掘出一些铁块和冶铁炉遗址。这

^① 金富轼:《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始祖温祚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年,第207页。

些考古发现都有力证明,百济建国前后时期已经掌握了炼铁技术并使用铁制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之上,百济还输入高句丽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以发展自身的生产。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百济也很早就建立了封建生产关系。百济的土地所有制包括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其中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充当了最基本的所有制元素,成为了社会经济最重要的担当部分。百济的国王也以各种名目对一些特殊阶层人士赐田和食邑,把土地分给贵族和功臣,推动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到了公元1世纪中叶,百济已跻身于朝鲜古代封建王朝的行列。百济的行政建制中央有左辅、右辅和一系列下、中、高级官僚机制,按照封建等级制组成。地方行政制度,起初分南北两部,两部之下设置许多城邑,由相关部门全权管理。

新罗早在公元前57年就已建国,但真正建立封建国家体制较晚于其他二国。自第十七代王奈勿尼师今(356—402)时代开始筹备,到第二十三代法兴王时期才基本完成了一个封建国家所需的国家体制。新罗的前身为斯卢国,原先是半岛南部庆州一带的部族小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后来斯卢国进行不断的领土扩张战争,合并和统一了周边一系列小国,成为了洛东江下游一带较大的部族联盟国家。斯卢国原来的六村及其贵族,成为了统一事业过程中的核心力量和后来新罗扩张时的骨干。这使得历来新罗的最高统治者尼师今、麻立干和国王都出自于这一骨干阶层之中。公元2世纪初,以此六村为中心的封建势力开始扩张领土,向北开辟了庆州以北的鸟岭地区,西渡洛东江上游,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公元2世纪前后,新罗的生产力相当发展,已广泛使用铁制生产工具。新罗前期主要存在封建地主的私田、国家直属土地、自耕农的个体土地等三种形式。在建国和不断扩张领土的过程中,新罗国王经常以赐田或分赐食邑的方式奖励勋臣和贵族,从而笼络人心和加强私有制。如法兴王在其十九年冬,“驾洛国王金仇衡降于新罗王,授位上等,以其国为食邑。”^①法兴王还把良田和战俘二百多人赐给镇压大加耶叛乱的各级将领。这些内容在《三国史记》中均有详尽记载。从朝鲜三国的历史看,那些受食邑者往往以此为基础想方设法不断扩大自己的私田,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在三国之间的征服战争中,新罗对不愿投降的地方用武力征服后,设置新的行政单位部曲、乡、所,对曲民实行残酷的剥削。新罗在建国前期实行贵族民主执政制度,各代王位由朴、昔、金三大姓轮流执掌,经一直以来继承过来的“和白会议”一致同意才能成为新的国王。新罗很早以来就实

^① 《东国通鉴》(卷五),“三国记·法兴王”。

行“骨品”制度,把贵族分为“圣骨”“真骨”“六头品”“五头品”“四头品”五个等级,按照各个不同等级分别规定任官级别和限度。新罗把京畿地区分为六部,地方分成 52 个城邑,而自 6 世纪开始实行郡县制。

朝鲜半岛地处温带地区,有着宜人的气候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占据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它的清川江、大同江、汉江、洛东江、锦江流域,土地肥沃,使得古代朝鲜三国利用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发展自己,各自成为了半岛割据一方的枭雄。

朝鲜半岛三面环海,山脉纵横,地处东北亚一隅,上古时代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社会发展也较为缓慢。这种自然和社会环境,一方面造就了朝鲜先民征服自然、建设家园和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他们浓厚的多神信仰、迷信思想和奉天命的宗教观念。朝鲜三国相继建立于具有浓厚的原始形态特征的部族联盟国家的基础之上,各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打上了前人的烙印。即使是后来从外部传入的儒、佛、道三教思想,也必然与本土传统的思想文化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站稳脚跟,在新的土壤上生根成长。朝鲜固有的信仰与文化,决定其民风民俗,更决定了从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各种文学样式。志怪、寓言和传说之类的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风土和当时现实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考察各种文献发现,朝鲜人民自古勤劳勇敢,善良智慧,也是极富浪漫精神的民族。在生产力不是很发达,不甚了解自然变化规律的历史阶段,朝鲜先人在极其艰难的生产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战斗精神。在自然灾害、病魔、战争等极其不利的事情来临时,他们一边与其斗争、抗衡,一边摸索着解决危机的方法和路径,更以歌唱与舞蹈的形式宣泄内心的各种情绪。而更多时候,他们的歌舞与宗教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向天帝和诸神表达献媚之意的机会,认为唱得越好、越投入,就越能够感动天帝和诸神灵,求得一家、一族、一国人的幸福安康。对此,历代各种文献早有记录。如中国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记录道:

(夫餘人)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
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①

夫餘是高句丽人分支出来的古代国家,其民之习俗和审美观念当然与高句丽人相似。每年殷正月祭祀天神,召开“国中大会”,连续几天“饮酒歌舞”,而且

^① 陈寿:《三国志·魏志·东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90 页。

“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此时的夫馀已进入封建社会初级阶段，但它还在很大程度上传承着其先人的习俗和信仰观念。高句丽人也有着与夫馀相似的风俗和信仰观念，《三国志》记载：

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①

这一记录比上述对夫馀的记载更丰富一些，传达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较为形象地记录了高句丽人“喜歌舞”的情景。高句丽“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记录显示，高句丽人的“喜歌舞”，首先不是宗教信仰仪式情景下的那种歌舞，而是纯粹的民间歌舞活动。后来的相关记载显示，高句丽的歌舞艺术已相当发达，达到了输出唐朝的水平，中国文献中所说的唐宫廷歌舞中的“高句丽伎”，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二是这一记录中反映了高句丽与祭天相关的信息。与夫馀实施“以殷正月祭天”不同，高句丽人“以十月祭天”。十月是东北亚地区的秋季，这时已见出一年农业生产的成果，无论是五谷丰登还是收成一般，人们都要感谢天神，希望来年给予更好的收成，以慰天下苍生。与夫馀一样，此时的高句丽也召开“国中大会”，进行祭天仪式，此时当然也少不了连日的歌舞活动；三是这一记录还反映了高句丽人祭祀地神的仪式情形。其“国东有大穴”，其名叫做“隧穴”，这无疑是供奉地神的所在，在“十月国中大会”的这一天，全民也以恭敬的心情到国邑东头，进行祭祀仪式，“迎隧神”。

这时的高句丽也进入了封建社会阶段，但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传承着其祖先的习俗与信仰意识。无论是夫馀人的“迎鼓”，还是高句丽人的“东盟”或“迎隧神”，都充分反映了他们对天地神灵的敬仰之心和虔诚的宗教信仰观念。诸多历史经验显示，这种对神灵的敬仰之心和虔诚的宗教信仰观念，正是人类神话、传说、志怪、寓言、传奇等文学要素生成的心理基础和思想背景，也是这些古代文学要素得以形成的艺术幻想和想象的心理基础。

由于高句丽地处朝鲜半岛最北部，与中国历代各个王朝直接交接或较为靠近，因此较之其他二国对中国古代先进文明接触得更早一些。现在虽很难确认中国汉字何时进入高句丽，但从史料记载推断其国初建时汉字随同其他汉文化已经进入高句丽，在其上层广为利用。高句丽朝廷自国初就设有博

^① 陈寿：《三国志·魏志·东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士,专门担当文书、教育方面的事务,而且在小兽林王之初已经设立大学教育子弟,这些都说明它使用汉字远早于百济和新罗。特别是高句丽在建国初已经修出官方史乘,记录了国家生活中的一系列大小事情。《三国史记》记录曰:

(婴阳王十一年)诏大学博士李文真,约古文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至是删修。^①

这里就明确记录着“国初始用文字”,而且“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高句丽于公元前 37 年正式建国,这一记录说明公元前后它已撰写出叫做《留记》的史书一百卷,足以证明它掌握汉字的时间之早和整个国家文明水平之高。婴阳王十一年(600),王诏博士李文真缩约该《留记》,名为《新集》,约分五卷。

因为传承了高句丽的血脉加之自身的努力发展,百济的思想文化也迅速发展,在半岛占据着不亚于其他两国的思想文化地位。从一些文献资料来看,百济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曾积极与中国江南的吴越地区沟通,进行了频繁的人员来往和文化交流,深受其影响。据《百济古记》,近肖古王二十九年(375),博士高兴撰著《书记》,写出了百济的官方国史。“百济自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自建国以来,百济励精图治,力求发展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不断提高在朝鲜半岛的地位。“(武王)四十一年……二月,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②为了达到发展的目的,它也学习和吸收中国的先进文明,加强实力,时刻准备与高句丽和新罗竞争。特别是百济跟当时日本的交通,显示出了一个汉文化强国的面貌。从时间上看,百济很早就与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阿莘王六年(397),为了处好与日本的关系,王以太子腆支为人质,派往日本王宫。《三国史记》记云:“六年夏五月,王与倭国结好,以太子腆支为质。”^③从历史上看,当时的日本比朝鲜三国落后了许多,它又与中国远隔大洋,为了迎头赶上,日本各代天皇积极与朝鲜三国中与自己距离最近的百济联络,加强了直接关系。当时的日本与百济来往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想从百济学习先进文化经验,并得到文化建设上的帮助。《日本书记》记曰:

^① 金富轼:《三国史记》,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 年,第 182 页。

^② 金富轼:《三国史记·百济本纪·武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 年,第 241 页。

^③ 金富轼:《三国史记·百济本纪·阿莘王》,首尔:乙酉文化社,1977 年,第 224 页。

应神二年(271),命荒田别,使于百济,搜聘有识者,国王择宗族,遣其孙辰孙王,随使入朝。应神喜焉,特加宠,以为皇太子之师。于是始传书籍,儒风文教兴焉。

日本应神天皇觉得缺乏汉学人才,特派重臣到百济求助。百济国王积极帮助,直接从宗族中挑选汉学优异的辰孙王,派往日本皇室,助其建立汉学基础。应神天皇非常高兴,“特加宠,以为皇太子之师”。估计辰孙王去日本时,绝对不会空手而去,肯定带一些有关汉学的经典和书籍,作为见面礼或教人的教材。记录载,从此“始传书籍,儒风文教兴”,日本文明进入了一个汉文化的时代。从此百济与日本的关系日趋密切,经常有百济学者前往日本皇室和朝廷,帮助其提高汉文化素养。据载,百济久素王又于应神天皇十五年(284),遣阿直岐前往倭国,次年还派王仁博士去倭王之侧,充当宫廷文师。后去的这些学者,都当上了皇子菟道雅郎子等皇子皇孙的老师,为日本培养皇室后代作出了贡献。他们带去的《千字文》《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为日本儒学的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古籍《和汉三才图会》记录道:

应神十五年,百济久素王,遣阿直岐者来。时阿直岐能读经,皇子菟道雅郎子师之。天皇问:“有胜汝之博士耶?”对曰:“有王仁者,胜于我。”帝遣使于百济,徵王仁。翌年二月,仁持《千字文》来朝,以《孝经》《论语》,授皇子菟道雅郎子,皇子以为师,习诸典籍,莫不通达。于是儒教始行于本朝。仁且咏《波津歌》,祝仁德宝祚,谓之“歌父”。^①

从这一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百济和倭国的关系相当密切,似乎不存在任何隔阂。同时这些记录也显示,百济实际上充当了倭国王室寻求学术人才的人才库,成为了倭国文明进步的文化保障地。的确,当时的倭国国情相对落后,甚至尚保留着很多原始的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而百济则与之相反,它在中国先进文明的启迪和刺激下快速发展,到了公元3世纪前后,百济的学术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讲,百济的帮助和提携,大大加快了当时日本文明的进程,而百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又得益于中国先进文明的助佑。

尽管公元2—3世纪,百济的汉文化水准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它从骨子里还是离不开自己从祖先那里继承过来的土俗文化。百济地处朝鲜

^① 寺岛良安:《和汉三才图会》,东京:平凡社,1991年。